

【国际比较】

冷战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

李钧鹏 许松影

【摘要】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社会学的学科史研究除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重要的人物、出版物、组织和制度,也将目光投向学术知识、学科制度、人际交往和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复杂关联。本文采取后一种思路,考察冷战所带来的重视科学技术、了解其他社会、对外文化宣传与对内管控等政府行为和文化氛围。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方面对美国社会学产生的六点影响:(1)学术界对政府资助的依赖加深;(2)跨学科合作和社会学学科自身认同深化;(3)研究对象和范围受到引导与限制,超脱政治的中立化姿态盛行;(4)科学主义传统进一步强化;(5)“个体—集体”社会模型得到延续和深化;(6)现代化理论等特定理论和方法出现或被广泛应用。时至今日,这些影响有些已经在美国本土消失,有些则扩散到了全球各地的社会学实践中。

【关键词】社会学史;知识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冷战

【作者简介】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社会学;许松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想史。

【原文出处】《社会学评论》(京),2023.6.5~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与体系重建研究”(18BSH014)。

尽管社会学的深层思想中存在着“战争抑制”(Kriegsverdrängung),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却与战争密切相关(约阿斯、克内布尔,2017:2)。更具体地说,战争是塑造社会学今日面貌的一股重要力量。以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和德国社会学的影响为例,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涂尔干学派的十多位成员在战争中丧生(Nandan, 1980: 12, 504),其中便包括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儿子安德烈·涂尔干(André Durkheim)以及被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Needham, 1973: xi)。一战中已然损失惨重的法国社会学在二战中又受重创:一方面,涂尔干本人的绝大多数档案被纳粹分子丢弃(Abbott, 2019: 3),而涂尔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为弄清家人被杀真相,只身前往德国军方所在地讨要说法,随即被捕,战争结束前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科瑟,2002: 12-13);另一方面,一战后到二战前,勒普雷学派(l'école de Le Play)赢得了国

际声誉,但随着法国被占领,该学派选择与纳粹政权合作,学术声誉严重受损,且再也没能恢复(屈安等, 2021: 115-126)。两次世界大战不仅击垮了两个原本大有希望的学派,也彻底改变了法国社会学的力量格局(科瑟,2002: 23-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社会学同样影响深远,尤其是导致了德国社会学的非历史化发展。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量德国历史社会学家流亡他国,战后也只剩一小部分人回归故里。战争期间,纳粹主导的社会学研究深度转向应用和量化方向,原本式微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随即扎根。二战之后,联邦德国的专业分科经历了“现代化”和“美国化”的过程(Steinmetz, 2017: 477-514)。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研究专家弗里德里希·腾布鲁克(Friedrich Tenbruck)为例,二战后此人协助美国占领军,以顾问身份参与民主基础上的德国高等教育重建工作,切断了德国社会科学与纳粹政权的关联。尽管腾布鲁克是研习哲学出身,但在重建德国社会科学的过程

中从德国古典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转向同时代的美国社会学以及经验主义取向,并将他的思路贯彻在德国社会学的高等教育改革中(Kaesler, 2016)。在国际层面上,两次世界大战是社会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重要推力。

相较于欧洲大陆,战争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样深刻。首先,美国社会学所受战争影响显然不限于两次世界大战,例如,1865年结束的南北战争不仅终结了美国南方地区的奴隶制度,而且顺带清扫了在战前为南方政府形式和经济政策辩护的社会科学(罗斯, 2018: 52-58)。

其次,即便限定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学所受影响也不限于以上所述内容,以院系为例,二战加强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沟通,间接促成了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导,涵盖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建立,而该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都是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中心之一(张弛, 2021: 333-354; Nichols, 1998: 87-103);以人物为例,二战前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均有重要成就的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由于为德国开脱战争罪责和否认对犹太人的屠杀,1945年之后不再见容于美国社会学界(Doencke, 1973: 313-323);此外,由于汉斯·格特(Hans Gerth)、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在流亡美国时带来了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这一原本在美国社会科学中被压制的传统也在战后稳健地成长起来,可以说二战间接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历史社会学在美国的兴起(芒克·斯奈德, 2022: 91-122)。

再次,在二战之后相对和平的世界格局中(加迪斯, 2011: 289),美国社会却经历了多重巨大变化,备受战争影响。除古巴导弹危机和“9·11”事件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对美国社会学影响深远,不仅激进主义传统借此在美国社会学中扎根,原本以帕森斯为首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广受批判,迅速崩溃(Steinmetz, 2007: 314-366; Wallerstein, 2007: 427)。

然而,与“热战”直接、可见的影响不同,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尽管同样形塑了美国社会

学,甚至在某些方面影响更加深远,却因为其隐晦不显的影响方式而难以察觉(Abbott & Sparrow, 2007: 281-313)。我们认为,冷战一方面强化了美国社会学的某些传统,另一方面则激发了一些新生特征。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本文希望说明,一个学科的发展轨迹从来就不只是其内在知识演化的结果,而是与特定历史阶段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下文首先进行文献考察,梳理冷战史和社会学史两个研究领域中的相关成果和不足;接着概述冷战时期对美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政府行为和社会氛围;然后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角度详细阐述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六点影响;最后总结全文,指出探究冷战对社会学的影响在当下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的发展:冷战史研究与社会学史研究

正如冷战史研究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之前,冷战史学的“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都将注意力放在高层政治决策和重大危机处理等事件之上,相对而言,冷战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文化界的参与和意识形态宣传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90年代之后,随着更多的档案材料公开,以及“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影响的深化,冷战史研究也更多注意到“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力量”(陈兼、余伟民, 2003: 16)。而在新冷战史关注的文化因素中,社会科学已成为重要对象。21世纪以来,针对冷战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这一研究议题,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于群, 2009: 128-149; Amadae, 2003; Backhouse & Fontaine, 2010: 184-233; Erickson, 2010: 386-392; Isaac, 2007: 725-746; Solovey & Cravens, 2012; Solovey & Dayé, 202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充分注意到政府和学界合作、学科合作与分化、研究领域的兴起或扩大等冷战影响,但往往同时考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主要是区域研究)等学科,并未针对社会学进行充分讨论。在专门讨论社会学的研究中,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与詹姆斯·斯派罗(James Sparrow)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及在这两场“热战”中间开始的冷战,一同加速了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存在于美国社会学中的三股趋向,即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立场、超脱纷争和保持中立

的政治立场,以及处于系统或集体中的原子化个人社会观(Abbott & Sparrow, 2007: 281-313)。尽管这项研究十分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阿伯特与斯派罗的考察时段截止于1955年。

另一方面,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学界没有集中讨论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但社会学史研究从1960年以来,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剑桥学派语境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已经在方法论上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在外部主义理论思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拥有经验成果作为支撑的理论方法,例如场域理论、社会网络分析、强纲领和行动者—网络理论(Camic & Gross, 2001: 236-249; Camic et al., 2011: 1-40; Jones, 1983: 447-469)。这些理论内在逻辑不同,但在下述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传统社会学史过度关注重点人物和组织创建,并且习惯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孤立地罗列重要人物和事件,而缺乏对历史场景的还原,同时未能关注到历史上诸多外部因素与社会学学科及社会学思想的因果关联。

本文无意于全面书写1946年至1991年的美国社会学史——毕竟,在这段丰富的历史中,受冷战影响的社会学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基于前述背景讨论,本文着重考察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各项举措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对美国社会学产生了何种影响。为了尽可能全面地说明这些影响,本文采用相对宽泛的“社会学”学科定义。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学科一般是三种现象的结合:“为研究领域创建边界的思想构造,定义了参与规则的制度结构,以及通过规范约束(参与者)表现方式的文化共同体。”(Wallerstein, 2007: 427)更为具体地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在思想上清楚界定自身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澄清自身与其他学科的差别,将区别于市场和国家的市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又或是充分应用田野调查等技术性方法;需要在制度上借助规则保障组织的稳定存在,维持与其他组织或学科的关联,制度性地存在于由政府部门、学院系、期刊及学会共同构成的网络之中;同时,也需要在文化上共享某些基本前提,避免分裂和各自为战,例如,确立和认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人的奠基性地位(沃勒斯坦, 2002: 240-250)。因此,本文的考察将侧重于冷战对

美国社会学在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方面的影响。

二、冷战中的美国政府行动和社会氛围

通常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正式发端于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以及1947年美国杜鲁门的国会演讲,终结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事件。这场斗争尽管不见硝烟,却遍布各个领域,美苏双方在各个领域竞逐领先地位,从经济水平到军事力量,从科学技术到意识形态,竞争激烈程度有时不下于真正的“热战”,而持续时间之久更使其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之一(莱弗勒, 2010: 433-447)。

在这一大规模、全方位对抗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美国社会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其中对社会学影响最为重大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重视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一方面,苏联军队以及苏联的军事武器发展,例如朝鲜战争和1949年苏联完成的核武器试验,都被视为实际的军事威胁,导致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科技军工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苏联在航空方面的成就,特别是1957年率先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更是令全美惊讶,后者认为自己已经落后,必须找回科技上的领先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为发展科技和基础科学而投入大量资金,也表现在创设诸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科研机构上(Backhouse & Fontaine, 2010: 194)。

第二,了解和研究对手。由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成为美国实实在在的军事和政治对手,美国政府急需深入了解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探究其历史,亦即其如何走向共产主义,也需要弄清楚这些国家当前的实力和未来发展潜力。因此,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设置、实际政策、经济规划、政治思想等内容,都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并向政府部门提交研究报告。这些意在强化政府与学术界合作的措施,催生了一批新的学科和学术研究人员,如区域研究及区域研究专家(Engerman, 2010: 397-398)。

第三,加强内部管控,控制学界的激进思想。二战后,由于朝鲜战场的不利战局和担忧共产主义渗

透,美国国内兴起了“反颠覆运动”,针对政府部门、文艺界和学术界进行排查。在这场大规模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挥下属委员会展开广泛调查,而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同样积极地搜寻共产主义分子,政府部门也对一些社会学家进行监视或调查。受监视或调查的人中,除W.E.B. 杜波伊斯(W.E.B. Du Bois)和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这样明确持激进主义立场的社会学家外(Keen, 1999: 17, 174),甚至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帕森斯(格哈特, 2009: 220-223)。

第四,进行文化宣传,抵制共产主义。美国政府部门,尤其是1947年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在冷战中网罗了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前左翼文化界人士,通过提供资金,使知识分子借助于刊物、图书、会议、展览等手段在美国本土和欧洲进行文化宣传,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大规模的心理宣传战。例如,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主持的“学说宣传项目”,便是社会科学家深度参与的文化宣传计划之一(于群, 2009: 128-147)。

第五,美国社会并未以完全消极的态度应对政府的国内与国外政策。在某些时期,社会公众和学术界积极回应冷战背景下的政府行为,导致冷战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到美国社会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中。更具体地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于60年代早期发动越南战争,而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并与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学生运动结合在一起,导致美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冲突状态中。由于一批社会学家积极参与运动,如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60年代也因此成为20世纪美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不仅终结了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学帝国,而且促使社会学将目光转向冲突、革命、行动者和文化,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美国社会学的面貌(亚历山大, 2000: 277-282; Sica & Turner,

2005)。然而,社会学激进传统的演变固然重要,但就冷战的影响而言,这并不是主要的结果。下文不打算全面讨论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而是集中考察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诸多影响。

三、政学合作、跨学科实践与学科认同

在政府大力发展科技、重视基础科学的背景下,冷战首先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学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导致社会学家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加深。冷战前,社会学家就已经与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资助的研究委员会展开合作,但数量较少,获得的资助也很少。例如,在1938年,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助按照最宽松的标准计算也只占到全部支出的25%,而且份额越来越低。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挤压下,社会科学的份额只剩下3%。此外,在1950年,对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的资助在军方的研发预算中也仅占1.5%(Solovey, 2013: 67, 71)。社会科学的合作对象主要是私立基金会,例如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Backhouse & Fontaine, 2010: 190-191)。与政府和军方的资助相比,私立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的资助力度更大,从1936年到1951年,平均有35%的资金流向了社会科学(Solovey, 2013: 104)。

冷战早期,社会科学仍旧相对不受重视,但社会科学家已经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大量技术人员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后续以‘军备竞赛’闻名的核武器研究中,这足以证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是决定民族国家在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重要因素。1950年,在历经五年的辩论之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为除医学——美国国家卫生健康中心(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负责——之外的所有科学领域提供联邦政府资助。在围绕创建这一机构展开的讨论中,社会科学的角色十分边缘化,很多成员认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不应该在资助范围内。美国社会科学家为了在新成立的机构中保有一席之地,将他们的研究工作描述为一项统一科学事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力争从一开始就把社会科学描述为严格且客观的。这一做法对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位置,以及政治家理解社会科学的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Zampieri & Bortolini, 2021: 170-171)

随着冷战的加剧,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社会学家在此之前只是担当国防事务部门的顾问,但通过提供分析工具以及呈送由调查得来的相关结论,在一些时候直接决定了政治和军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成为国防事务“实际的操纵者”(李波厄特,2008:325)。例如,心理战略委员会在冷战早期主持了“学说宣传项目”,并于1952年完成了一份题为《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在政府内部各相关机构的高层中传达,征求意见,还请一些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参阅。其中有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于群,2009:135)。又如,1964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将其掌握的政府资金投入有关发展和军事的研究中,而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拿到了该中心分包出去的最大合同,用于军事社会学研究,以裨补政府政策(Simpson,1998:80)。

社会学在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的同时,自身对政府部门的依赖也在加强。尽管“从绝对数字上讲,社会科学得到的资助显然远远小于自然科学,然而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助,令二战到70年代的社会科学获得了实质性的大规模扩张。……国家科学基金会创建于1950年,1957年便开展了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尽管独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从未成立,但到1968年,社会科学已经逐渐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正式成员资格’”(Backhouse & Fontaine,2010:192)。社会学家主动寻求与政府部门合作,获得政府资助,如阿伯特与斯派罗所说:“帕森斯没能说服国会。然而,在整个学科还等着(国会)把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范围的时候,很多社会学家都以个人名义寻找海军研究办公室、国防部、国务院以及兰德公司的资助。……战时机构向社会学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特别是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些资助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学家的欲望。”(Abbott & Sparrow,2007:296,298)

例如,1964年,在国防部资助下,美国军方的特种作战研究办公室(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牵头成立了卡米洛特项目(Project Camelot),以华盛

顿大学等研究机构为活动中心,邀请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家完成以下任务:“提出一个一般的社会系统模型,从而使预测和政治干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成为可能。”(Horowitz,1967:47)美国国防部甚至要求该项目的成果能够在四年之后应用到智利(Navarro,2011:808)。在参与该项目的社会学家中,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供了技术支持,此外,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尽管并未主动参与到该项目之中,但由于他在《旺代之乱》(*The Vendée*)一书中对法国革命与地区骚乱的深入研究,也在受邀之列,并于1965年8月参加了该项目的碰头会。该项目在向军方提供的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其有关社会变迁、社会动乱与社会控制的研究,尤其建立在蒂利与吉尔伯特·夏皮罗(Gilbert Shapiro)等社会学家的观点之上(Navarro,2011:811-812)。尽管卡米洛特项目因为进展情况不佳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被智利共产党揭发后备受抨击,但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1966年对它的评价却是:“社会科学迄今为止的所有项目中,还没有哪一个比卡米洛特项目更加广泛、更加多元,在国民政府中的位置更高。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政策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方面,就卡米洛特项目所产出的结果(或许不无益处)而言,没有其他项目可与之相提并论。”(Horowitz,1967:313)换言之,在冷战背景下诞生的卡米洛特项目,正是社会学与政府机构合作深化的一个典型。

其次,由于二战中政府部门要求完成的研究项目或政府资助的学术机构的研究议题往往规模很大,涉及人员多、时间跨度长且内部高度复杂(例如民意调查或现代国家的兴起),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因此,项目本身提供了不同学科研究者进行合作的机会,而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都证明自身有能力处理特定问题。“(战时)机构服务与全新的大项目模式,令社会学家与其他领域的专家有机会亲密接触,从而延续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20世纪20年代开启的跨学科进程。实际上,战时经历导致社会心理学这个原本处在学科之间而并不隶属于某一单一学科的研究领域,成了社会学的次

级学科。”(Abbott & Sparrow, 2007: 294)这一跨学科的趋势持续到了50年代,也就是冷战早期,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些将经济学和社会学专业合并的院系(Backhouse & Fontaine, 2010: 186)。

然而,随着冷战的激烈化,政治科学逐渐在各学科的均衡合作中凸显出重要性,并主导了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会资助下的研究项目。同时,美国国防部受《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影响,更偏爱资助人文学科与历史学,而非社会科学。原因在于,《国防教育法》是美国政府回应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地球卫星的一个结果,该法案既强调自然科学作为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又强调了解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重要性,因而,法案的重心落在了区域研究(主要是苏联,也包括中国、拉丁美洲与亚洲其他国家)和语言学上,侧重于国内研究和应用调查的社会科学并非重心所在(Solovey, 2013: 95)。相较于二战期间和冷战早期(主要是与农业部和军队合作),社会学参与政府资助项目的机会也在减少(Backhouse & Fontaine, 2010: 186, 194)。此外,社会学本身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的代表流派结构功能主义,也不利于跨学科深化。尽管帕森斯在1946年主持创建了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在内的社会关系系,但帕森斯并不主张与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展开密切合作,而且社会关系系中各个学科的合作状况不佳,60年代开始,不同专业的研究已近乎自行其是(张弛, 2021: 351-353; Nichols, 1998: 99-104)。

四、中立化与科学化

中立化(价值无涉、不介入政治)和科学化(强调经验、数据和可检验性)本身即是社会学的重要传统,这两种沃勒斯坦意义上的社会学文化很多时候十分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的批评者习惯于使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个统称。然而,这两个传统在美国社会学中,并非一开始都存在或受到支持: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尽管推崇科学主义,却并不主张价值中立和无视现实社会问题(罗斯, 2018: 313-365; Abbott & Sparrow, 2007: 297),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学家介入现实的

非中立化立场。

一方面,美国社会学自创始便采取科学主义立场,并且这一立场在后续的“热战”和冷战中不断被强化。20年代,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以科学的名义拒斥改良主义;30年代,帕森斯主张对社会行动展开理性主义的科学分析,而经验主义的科学分析则体现在大量社会调查分析中,典型如萨缪尔·斯托弗(Samuel Stouffer)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完成于1937年的《大萧条时期家庭研究备忘录》(*Research Memorandum on the Family in the Depression*) (Schweber, 2002: 65-94)。

二战直观地向社会学家展现了科学的力量,也就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所能拥有的力量。社会学家在战争中不断强调研究的有用性和现实性,要求科学地,特别是量化地改造社会学,导致美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加深和对定性研究的歧视,因为只有科学的和实用的研究,才能令社会学为战争中的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Rawls, 2018: 526-546)。例如,在1943年召开的跨学科会议中,帕森斯等与会人员认为,科学是“一套统一的方法,一种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将重新塑造非生物的世界、生命科学,以及对人类和社会关系的研究。……社会科学被认为继承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和标准,要提升其地位,提高其有效性”(张弛, 2021: 343)。

冷战的到来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原因除了冷战始终存在演变为“热战”的可能性(例如古巴危机)这一点,还与政府部门对受其资助的社会学家的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偏爱对民众的数据调查分析,向政府部门提交的报告应当是简练、准确与科学的。“总而言之,战争深化和圆满化了(美国)社会学对科学的爱恋。”(Abbott & Sparrow, 2007: 300)与此同时,社会学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也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不满,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皮季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在195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及相关科学的时尚与弊端》中,索罗金嘲讽社会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认为同时代的社会学充斥着花哨的黑话和冒牌的科学口号,在崇拜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背景下,社会学家笔下的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原子

的仙境”(Sorokin, 1965: 213-249), 毫无社会学自身的特色, 也丧失了与社会学古典传统的关联。然而, 索罗金的代表性是双重的: 他对社会学自然科学化的批判固然具有代表意义, 但他本人到20世纪50年代早已经处在美国社会学的边缘地带, 甚至被视为“贱民”一般的人物(Tiryakian, 2013: 15), 他的边缘地位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即社会学的主流已经摆动到了远离人文主义的科学主义一极。

然而, 另一方面, 冷战中的政府行为和社会氛围, 却并不十分有利于社会学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超脱政治的中立化姿态反倒更为普遍。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 研究对象和范围受到引导与限制, 军方或政府需要并出资鼓励研究特定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 某些研究领域和思想理论则受到明令限制, 或被暗中阻止。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斯托弗, 尽管已经是成名人物, 政治立场偏保守(不重视阶级冲突、种族对抗等社会问题), 而且其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深为学术界推崇, 但由于在50年代早期研究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斯托弗受到调查, 随后失去参与机密调查的资格(格哈特, 2009: 220; Abbott & Sparrow, 2007: 300)。第二, 更重要的是, 鉴于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计划(social planning)或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过于接近, 而社会计划又是纳粹德国的标准经济政策, 社会学家担心自身提出的社会政策与社会计划会导向新的极权主义(Abbott & Sparrow, 2007: 299)。

总而言之, 政府部门偏爱自然科学, 为自然科学提供大量资助, 而相对看轻社会科学, 不仅在是否把社会科学纳入支持范围上有所犹豫, 而且约束和限制部分社会科学活动。与此同时, 研究者也越来越接受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形象, 认为“美国社会科学应当是没有威慑性的、侧重于技术性、非党派的和价值中立的专职事业”(Backhouse & Fontaine, 2010: 199)。在这个双重作用的过程中, 社会学的形象发生了重要转型, 其代表人物从强调社会参与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式学者, 转变为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式的“漂浮知识分子”。

社会学家确实不是全体噤声。例如, 米尔斯在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一书中抨击美国社会中军事力量与公民力量之间的严重失衡(Mills, 1960); 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则指出, 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即便在美国社会学的激进传统中也正在加深加大, 为应对激烈变动的社会学, 社会学必须转向更具批判性、更有实践意识的反思社会学(Gouldner, 1970: 3)。又如, 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学生运动等社会背景下, 尤金·格洛弗斯(Eugene Groves)、马丁·尼古劳斯(Martin Nicolaus)、迪克·弗莱克斯(Dick Flacks)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领导了社会学解放运动(Sociology Liberation Movement)。而作为一个激进派非正式组织, 社会学解放运动的成员与美国社会学的所谓“建制派”产生了直接的冲突。在1968年于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上, 尼古劳斯在题为“金主社会学”(fat-cat sociology)的回应发言中, 讥讽美国社会学家已成为政府的应声虫, 而这一回应令在场的保守派社会学家大为不忿, 双方围绕社会学的使命展开了激烈争论(Gouldner, 1970: 10-11; Nicolaus, 1969: 154-156; Oppenheimer et al., 1991; Roach, 1970: 224-233)。

尽管如此, 从整体上看, 社会学家的确改变了20世纪早期介入现实的积极态度, 而社会学的中立化形象最鲜明地体现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学”(转引自Gilman, 2003: 59)的提法中。

五、“个体—集体”社会观与现代化理论

二战前, W.I. 托马斯(W.I. Thomas)、帕克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是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该学派倡导经验调查和定性研究, 在社区、城市、种族、人际互动和偏差行为等研究领域成果显著。对帕克和伯吉斯等人来说, 处在预设层次的“社会模型”并不是一个“个人—社会”相对立的二元模型, 相反, “社会”是多元化、中层化和经验化的存在, 充斥着教会、志愿者和商业团体、帮派、俱乐部等社会组织(Abbott & Sparrow, 2007: 312)。对芝加哥学派来说, 理论上并不存在个人与社会的截然区分, 因为既不存在完全孤立的个人, 也不存在包容一切的社会。

二战期间, 随着帕森斯、斯托弗和拉扎斯菲尔德

等人崭露头角,芝加哥学派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观逐渐让位于只有个体和集体两个抽象层次的“个体—集体”(Individual-Collectivity)模型(简称“I-C”模型)。更为具体地说:“根据I-C模型,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抽象层次:个体与集体。如何理论化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止一种方案:例如(1)微观/宏观区分(个人持有一种‘大’社会的图像);(2)规范性关系(社会提供了治理或‘整合’个人的‘准则’);(3)纯粹加总关系(社会只是累加在一起的个人态度或行为的表现)。但是,这三种方案都认为各个层次是截然分离的,彼此之间的关联也是抽象和无时间的。”(Abbott & Sparrow, 2007: 301-302)

社会观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首先是由于战时的爱国热情放大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集体由此成为压倒性的社会事实;其次,在接受政府部门资助的斯托弗等人那里,主要的研究问题是中层社会组织因战争和社会转型而来的失效,以及个人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组织(Abbott & Sparrow, 2007: 303-304)。此外,尽管帕森斯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并不是战争的直接产物,但该书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涂尔干式理解却与斯托弗等人产生共鸣,共同导致这一新的社会模型稳定下来。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有着非关系、非经验、非语境和无时间等特性,因此从长远的影响来看,战时的这一思想改变,实际上已经为之后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和微观—宏观链接难题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战中确立的社会观在冷战期间再未产生根本改变,只是出现了理解两个层次之间关系的新的方案。一方面,很多在战争中受到创伤和破坏的中间社会组织,在冷战期间要么没能恢复或者重建,要么随着社会转型而进一步消失。到20世纪50年代,“大社会”的形象已经基本成为现实,“I-C”模型更加稳固,以至于科尔曼在70年代提出“新社会需要新社会学”的主张(Abbott & Sparrow, 2007: 308)。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在二战期间勃兴的科层化进程,在冷战中同样得到延续,科层制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因战争威胁而不断出现的新的政府部门,也包括和政府部门来往密切的学术界。如此一来,科层制顺理成章地成为沟通个体与集体这两个

层次最终的中间组织或制度,并成为社会学家理解人的行为、组织常态等问题的标准答案。而对社会生活的科层制理解,亦即静态的、等级的、抽象的、层次分明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学术管理和创作,导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专辟一章讨论社会科学的“科层制气质”(米尔斯, 2017: 139-164)。

伴随着制度上的跨学科发展、科学主义的社会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科层制理解,以及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一系列政治、经济与文化特征的出现,社会学也在冷战时期迎来了20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之一: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直接源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以下两点:(1)社会分化或功能分化,即现代社会是一个承载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相互分离的社会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自主运行,互不干扰且相互补充,这是社会运行的最佳状态;(2)社会定向进化或历史定向发展,即人类社会按照从前现代(未分化的社会或欠发达社会)到现代的方向发展,美国及若干欧洲国家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模式,亚非拉国家也将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艾森斯塔德, 1988: 1-22; Baber, 2001: 71-85)。

社会学不仅是现代化理论的策源地,也是其发展和应用(主要是学术应用,如历史分析)的主要推动力量(沃勒斯坦, 2003: 135-141; Gilman, 2003: 72-112; Gusfield, 1967: 351-362; Inkeles, 1969: 208-225),但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传播都有着冷战的背景。首先,冷战是作为现代化理论思想母体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背景。在帕森斯看来,美国在二战后尽管已经成为实质上的世界领导者,但美国社会却没有为这一领导地位做好准备,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麦卡锡主义等负面事件就是典型表现,表明美国人并不清楚何种形式的社会才是好的(Gerhardt, 2017: 439)。而帕森斯与其合作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等人在20世纪中叶发展出系统的社会理论(theory of society),特别是以四功能模式(又称AGIL模式)为核心的社会系统模型和带有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进化论色彩的社会变迁模型,以说明何种社会形式最好,为社会学发展和政府政策制定同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Parsons, 1966; Parsons

et al., 1961)。

其次,随着一批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生进入学术界或政界,这一宏大的理论逐渐传播开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白鲁恂(Lucien Pye)、W.W. 罗斯托(W.W. Rostow)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支持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政府之所以支持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与其在冷战中的意图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政府寄希望于该理论能够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从而切实有助于欧洲和亚洲地区盟友国家的社会恢复与发展。另一方面,美国需要一种能够对抗苏联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展开思想和文化宣传,“在‘先进’国家和他们试图要分析的发展中世界之间划下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雷迅马, 2003: 100),同时进攻性地批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从后续具体的实践或应用上看,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国内外、当下和未来至少产生了以下四种影响:(1)应用于区域研究中,成为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了解其他国家的一个工具,例如,马里昂·莱维对中国家庭的研究(Levy, 1968)和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对日本宗教的研究(贝拉, 1998)。

(2)逐步统一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目光集中于社会系统和社会变迁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图景,包括社会学、比较政治研究、社会史与发展经济学等学科或亚学科。例如,阿尔蒙德接受帕森斯按照模式变项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观点,主张不宜过分重视地区差异性,因为所有的不发达国家最终都将迈向现代社会;白鲁恂认为,尽管不发达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会一帆风顺,但文化的发展仍然遵循一般模式,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向不发达社会引入民主等现代产物,以加速社会的发展(雷迅马, 2003: 60-66)。由于白鲁恂和阿尔蒙德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享有主导地位,他们能够将研究经费分配到持有相似观点的人手中,由此产出更多的支持现代化理论的作品。以阿尔蒙德与蒂利的交往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蒂利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工作时,阿尔蒙德向其发出邀请,希望蒂利

召集一批历史学家,参照现代化理论的序列发展模式考察西欧的历史,同时也证实一下现代化理论。最终,蒂利作为主编于1975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直接导致“国家形构”(state formation)这个极富现代化理论色彩的概念流传开来,成为社会科学界广泛使用的概念(Little & Tilly, 2007)。

(3)为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为干预欠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拉丁美洲地区为例,罗斯托在1961年向肯尼迪总统提交报告,认为为了改善美国周边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政府有必要在拉丁美洲国家到达某个发展阶段时提供援助,这将有效促进该国的经济腾飞,扭转拉美地区的贫困化与权威政治趋势。按照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的历史规律,这种援助会很有把握。肯尼迪政府采纳了罗斯托的意见,尽管最终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现代化理论受到政府重视的程度,的确是之前所有理论都没有享受过的:“理论家在政府中充当顾问和政策制定者,在计划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手段的选择上施加影响力。”(雷迅马, 2003: 113)

(4)由于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且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理论,现代化理论在美国国内提供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念的思想武器,从而相当圆满地完成了所谓抵抗共产主义国家文化渗透的政治宣传任务。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术会议等沟通形式,表面上毫无规范意图的现代化理论扩散到第三世界,在结构功能主义经历了冲突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攻击而崩塌之后,现代化理论却存活了下来,特殊/普遍、传统/现代、一体/分化、计划/市场、权威/民主等二元话语至今仍然留存于学术界和政治界。在追寻“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努力中,美式现代化理论的痕迹并未完全消散(徐秀丽、李小云, 2020: 94-103)。

总的说来,从内容上看,现代化理论的“辞藻及其基本假设都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冷战文化”(雷迅马, 2003: 109),而它的意义正如阿伯特与斯派罗所说:“现代化理论将所有这些趋向编织进一个全球系

统中,这个理论是战后社会科学的伟大范式,是冷战高潮时期沟通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的最重要纽带。”(Abbott & Sparrow, 2007: 312)对美国社会学而言,在冷战背景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主导性的社会理论,而且成为美国政府抵抗共产主义文化渗透、进行国际干预的思想工具,更是美国社会学向其他国家社会学输出最为成功的理论之一。

此外,二战中起步的计算机研发,在冷战期间美苏科技和军事竞赛的背景下继续发展,20世纪50年代IBM公司的机械计算机便已经投入商业使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到60年代末针对连续变量的计算机和软件(SPSS)投入市场,原本在社会学统计方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双变量相关分析方法迅速让位于多元回归分析,而后一种方法此前一直因为技术不能实现而被搁置(Bargheer, 2021: 259-260)。易言之,冷战还间接引发了社会学在统计技术方面的革新。

六、总结

汉斯·约阿斯(Hans Joas)与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l)注意到,二战以来,战争并不存在于社会学有意识的思考中:“只需一瞥1945年之后的社会学……我们会注意到暴力和战争对其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地微乎其微。”(约阿斯、克内布尔, 2017: 1)然而,战争却始终是社会学无意识的一部分,正如安妮·罗尔斯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战时叙事催生出一一种围绕统一和分歧的修辞,也就是区分开‘好’社会学和‘坏’社会学……这一叙事所创造出的社会/道德范畴,仍旧以默会和未经检验的方式塑造着今天的社会学辩论。”(Rawls, 2018: 7, 17)

如果我们从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出发,将战争视为现代性的余孽或残留物,随着历史演化和社会进步,未来的大同社会必然是一个和平社会,那研究过去的东西的确意义有限。然而,我们不免要反躬自问:当代世界果然不存在战争了吗?今天是否还能以轻率的姿态声称俄乌战争就像海湾战争一样“从未发生”? 大国之间或阵营之间会有新冷战吗?

又或许,在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背景下,新的冷战是否已经开始? 我们的回答是,社会学除了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战争,克服“对战争的抑制”,还应当关注战争和冷战对学科自身的影响,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和启迪,以免将某些在战时状态下形成的制度、知识和关注点视为学科自身独立发展的产物——例如,因与政府或其他组织合作而形成的学术研究项目化、思维与表述的自然科学化和数理化、对定性研究的怀疑与排斥,以及担负了意识形态功能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甚至将这些趋向与选择视为社会学不可更改的特性。而本文的核心目标,便在于找出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以此说明社会学发展与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关联。

不同于“热战”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以及对社会学可见且即时的改造,冷战尽管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历史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它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却并不容易辨识。然而,冷战毫无疑问是影响美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相较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由于创造了一个“力场”(force field)而对社会学产生了更加持久的影响,甚至“定义了那段时期思想活动的轮廓”(Rajagopal, 2022: 1)。本文从制度、文化和思想三个方面着手,概括性地说明了冷战对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指出冷战一方面强化了二战以来美国社会学的若干特征,另一方面又改变了二战以来美国社会学的某些特征,其整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本文是针对整体状况做出的观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将冷战总体化、未细分诸多阶段以及诸特征等问题。本文做了一些可供拓展的初步观察,也期待上述问题在后续研究中,能够随着材料的丰富和方法的进步而逐步解决。

与此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学家对战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全球冲突的阴影再度笼罩世界的当下,战争本身也开始重回社会学家的视野(Brewer, 2022; Malesevic, 2010; Smith, 2005),但战争作为现代性之

表1 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

冷战的影响	制度	文化	思想
强化	政府与学术界合作、跨学科实践	科学主义	“个体—集体”社会观
催生	学科认同深化	中立化	现代化理论

“残余”的传统观点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从战争的视角理解社会学,审视社会学与战争的关系,揭示战争在社会学身上留下的制度、文化与思想痕迹,令社会学摆脱“战争抑制”的旧习性,从而锻造出思考当代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不仅是社会学反思性的内在要求,也不只是发展战争社会学理论的准备工作——在战争与和平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它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冷战虽已终结,冷战的影响却远未终结。对于中国社会学人来说,梳理冷战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其意义远超简单的思想史叙述,而是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学这门学科及其知识生产的社会存在问题。近代中国饱受战争之苦,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事实上以战争为其隐含背景。中国现代社会学发端于内忧外患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又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因此,中国现代社会学自诞生伊始便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承担了救国救民、富国强民及“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推动社会改良”的历史任务(阎明,2010:2,355)。然而,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战争造就的动荡社会环境所致,中国社会学迟迟未能在本土化与全球化、政策性与学术性、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理想的位置,而这些问题至今仍以种种方式困扰着当代中国学人。至于冷战所带来或加剧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以及西方学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更对中国社会学的内在形式与外在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考虑到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学所承载的历史遗产,理清战争与社会学关系这项迫切的任务,便更多了一份反思学科使命与赓续学科传统的严肃含义。

参考文献:

- [1]艾森斯塔德,1988,《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沈原、陈育国、迟刚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贝拉,1998,《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3]陈兼、余伟民,2003,《“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第3期。
- [4]格哈特,2009,《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李康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5]加迪斯,2011,《冷战史——长和平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6]科瑟,2002,《导论:莫里斯·哈布瓦赫》,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7]莱弗勒,2010,《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8]雷迅马,2003,《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9]李波厄特,2008,《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郭学堂、潘忠歧、孙小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10]罗斯,2018,《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王楠、刘阳、吴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1]芒克、斯奈德,2022,《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汪卫华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 [12]米尔斯,2017,《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3]屈安、格雷勒、埃尔武埃,2021,《社会学史》,唐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4]沃勒斯坦,2002,《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5]——,2003,《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16]徐秀丽、李小云,2020,《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文化纵横》第1期。
- [17]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贾春增、董天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18]阎明,2010,《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于群,2009,《新冷战史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20]约阿斯、克内布尔,2017,《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张志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1]张弛,2021,《重估政治:理解18世纪法国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2]Abbott, Andrew. 2019. "Living One's Theories: Moral Consistency in the Life of Émile Durkheim." *Sociological Theory* 37(1).
- [23]Abbott, Andrew & James T. Sparrow. 2007. "Hot War, Cold War: The Structures of Sociological Action, 1940–1955." In Craig Calhoun(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4]Amadae, S. M. 2003.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5]Baber, Zaheer. 2001."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1(1).
- [26]Backhouse, Roger E. & Philippe Fontaine(eds.). 2010.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7]Bargheer, Stefan. 2021."Paper Tool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ow the 2×2 Table Shaped the Work of Mills, Lazarsfeld, and Parsons." *American Sociologist* 52(2).
- [28]Brewer, John D. 2022.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Peace Process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29]Camic, Charles & Neil Gross. 2001."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 In Judith R. Blau(ed.),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 [30]Camic, Charles, Neil Gross & Michèle Lamont(eds.). 2011. *Social Knowledge in the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1]Doenecke, Justus D. 1973."Harry Elmer Barnes."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56(4).
- [32]Erickson, Paul. 2010."Mathematical Models,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earch for Cold War Culture." *Isis* 101(2).
- [33]Engerman, David C. 2010."Social Science in the Cold War." *Isis* 101(2).
- [34]Gerhardt, Uta. 2017."Confrontation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Talcott Parsons." *Sociologický Časopis/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53(3).
- [35]Gilman, Nils. 2003. *Mandarin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36]Gouldner, Alvin 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 [37]Gusfield, Joseph. 1967."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4).
- [38]Horowitz, Irving Louis(ed.). 1967.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ject Camelot: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cience and Practical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 [39]Inkeles, Alex. 1969."Making Men Modern: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5(2).
- [40]Isaac, Joel. 2007."The Human Sciences in Cold War America." *Historical Journal* 50(3).
- [41]Jones, Robert Alun. 1983."The New History of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 [42]Kaesler, Dirk. 2016."Tenbruck, Friedrich Heinrich."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18756-451.html-#ndb-content>, 2022-12-31.
- [43]Keen, Mike Forrest. 1999. *Stalk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J. Edgar Hoover's FBI Surveillance of American Sociology*. Westport: Greenwood.
- [44]Levy, Marion. 1968.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Atheneum.
- [45]Little, Daniel & Charles Tilly. 2007."Charles Tilly Was Interviewed on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 on Dec.15, 2007." http://www-personal.umd.umich.edu/~delittle/Research_Page/Tilly.html, 2023-03-13.
- [46]Malesevic, Sinisa. 2010.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7]Mills, Charles Wright. 1960.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2nd ed. New York: Ballantine.
- [48]Nandan, Yash(ed.). 1980. *Emile Durkheim: Contributions to L'Annee Sociologiqu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49]Navarro, Juan José. 2011."Cold War in Latin America: The Camelot Project(1964-1965) and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Reactions of the Chilean Left." *Comparative Sociology* 10.
- [50]Needham, Rodney(ed.). 1973. *Right and Left: Essays on Dual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1]Nichols, Lawrence T. 1998."Social Relations Undone: Disciplinary Divergence and Departmental Politics at Harvard, 1946-1970." *American Sociologist* 29.
- [52]Nicolaus, Martin. 1969."Remarks at ASA Convention." *American Sociologist* 4(2).
- [53]Openheimer, Martin, Martin J. Murray & Rhonda F. Levine (eds.). 1991. *Radical Sociologists and the Movement: Experiences, Lessons, and Legac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54]Parsons, Talcott. 1966. *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55]Parsons, Talcott, Edward Shils, Kaspar D. Naegele & Jesse R. Pitts(eds.). 1961.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 and vol.2.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56]Rawls, Anne Warfield. 2018."The Wartime Narrative in US Sociology, 1940-1947: Stigmatiz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in the Name of '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1(4).
- [57]Rajagopal, Arvind. 2022."Robert Bellah: A Cold War Sociologist?" *Civic Sociology* 3(1).
- [58]Roach, Jack L. 1970."The Radical Sociology Movement: A Short History and Commentar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5(3).

[59]Schweber, Libby. 2002."Wartime Research and the Quantific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The View from the American Soldier."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6).

[60]Sica, Alan & Stephen Turner(eds.). 2005. *The Disobedient Generation: Social Theorists in the Six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1]Simpson, Christopher. 1998.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62]Smith, Philip. 2005. *Why War? The Cultural Logic of Iraq, the Gulf War, and Sue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3]Solovey, Mark. 2013. *Shaky Foundations: 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 in Cold War Americ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64]Solovey, Mark & Hamilton Cravens(eds.). 2012. *Cold War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Liberal Democrac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65]Solovey, Mark & Christian Day (eds.). 2021. *Cold War Social Science: 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66]Sorokin, Pitirim. 1965. *Fads and Foibles in Modern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 Chicago: Henry Regnery.

[67]Steinmetz, George. 2007."American Sociology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The(Temporary) Settling of a Disciplinary Field." In Craig Calhoun(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8]——. 2017."Field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Germany and Franc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9(2).

[69]Tiryakian, Edward. 2013."Dmitri Shalin Interview with Edward Tiryakian about Erving Goffman Entitled 'Parsons Was about 5'6" or 5'5" but When He Started to Speak, He Got to Be Six Feet Five'." In Dmitri N. Shalin, *Bios Sociologicus: The Erving Goffman Archives*, https://digitalscholarship.unlv.edu/goffman_archives/69, 2023-03-13.

[70]Wallerstein, Immanuel. 2007."The Culture of Sociology in Disarray: The Impact of 1968 on U.S. Sociologists." In Craig Calhoun(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1]Zampieri, Giovanni & Matteo Bortolini. 2021."Finding Sociology in Its Funding? Networks, Relations, and Key Players in Late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ologica* 15(3).

Cold W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ociology

Li Junpeng Xu Songying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has not only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historiography by sorting out important figures, public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but also focused o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academic knowledge,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backgrounds. Following the latter line of think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Cold War o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ociology.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such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igating other societies, cultural propaganda and thought control triggered by the Cold War bring about six outcomes of American sociology from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1) academia is more reliant on government funding;(2)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sociology's own identity;(3) the scope of research is misled and limited, and a neutral attitude beyond politics prevails;(4) the existing tradition of scientism is further strengthened;(5) the "Individuality-Collectivity" social model has been continued and deepened;(6) specific theories and methods such as modernization theory have emerged or been widely used. Today, some of these influences have disappe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have spread to sociological field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history of sociolog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sociology; Cold War